



冯绍雷 相蓝欣

主 编

转型中的 俄罗斯对外战略



转
型
时
代

丛书

上海人民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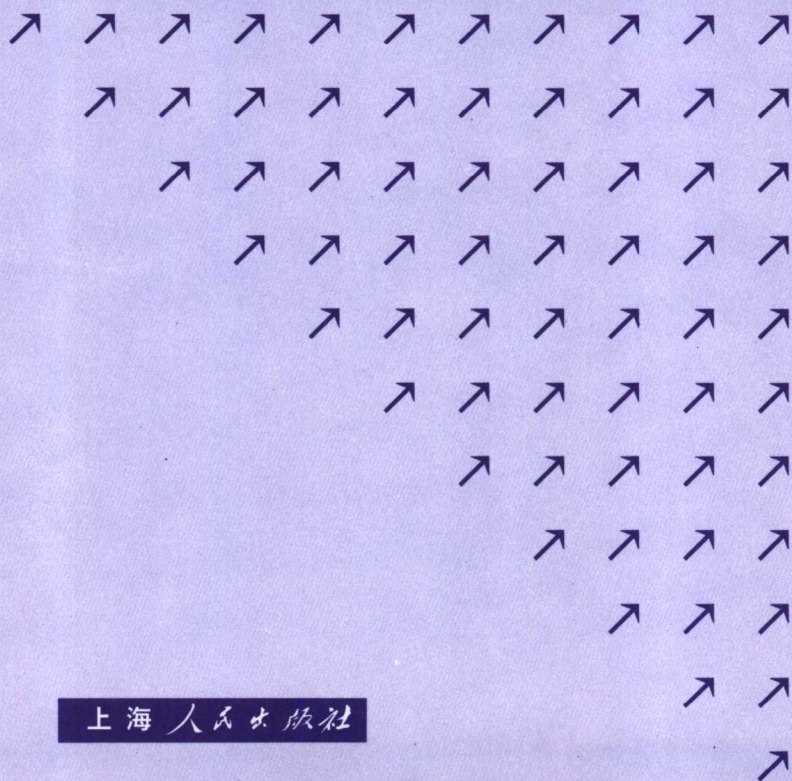
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项目成果



冯绍雷 相蓝欣

主 编

转型中的 俄罗斯对外战略



转型时代

丛书

上海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转型中的俄罗斯对外战略/冯绍雷,相蓝欣主编.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

(转型时代丛书)

ISBN 7-208-05525-4

I. 转... II. ①冯...②相... III. 对外政策-研究-俄罗斯 IV. D851.2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009436 号

责任编辑 杨承纮

装帧设计 傅惟本

· 转型时代丛书 ·

转型中的俄罗斯对外战略

冯绍雷 相蓝欣 主编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c)

世纪出版集团发行中心发行

商务印书馆上海印刷股份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787 × 1092 1/16 印张 25.25 插页 2 字数 507,000

2005 年 4 月第 1 版 2005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208-05525-4/D · 951

定价 42.00 元

总序

冯绍雷

作为一个划时代的重要事件,苏联解体已经过去了十四个年头。这十四年来人们关于苏联解体,特别是尔后关于俄罗斯等前苏联国家所发生的变化有无穷无尽的争论。尽管争论中的各派意见无法一致,但争论的主题却相当鲜明,那就是解体之后的俄罗斯向何处去。如果用学术语言来表达的话,人们思考的核心问题是,俄罗斯以及前苏联各国以制度变迁为核心的社会转型,具有怎样的起因与动力,将如何起步,并遵循何种路径,还有对迄今为止的转型过程及其结果作出何种评价,以及给予怎样的前瞻性估计。

以制度变迁为核心的这样一场社会转型之所以引起人们的普遍关注,首先是因为这一宏大的社会过程是发生在前苏联(俄罗斯)这样一个具有丰富多样的历史与文化背景的前超级大国。20 世纪的 80 年代中期,当精力旺盛的新一代政治家戈尔巴乔夫踌躇满志地入主克里姆林宫,并掀起一场天翻地覆的改革运动时,几乎没有人会预料到,时过六年,像苏联这样的庞然大物居然会土崩瓦解于顷刻之间。苏联的解体带来的是冷战格局的终结,并由此而引发了一波又一波的各个国家、各个民族,特别是大国间关系的复杂变化,迄今仍未止息。

何以一国之中的制度变迁会引发如此巨大的连锁反应,人们不得不从催生剧变的制度变迁本身寻找原因。

纵观世界历史进程,人们发现在前苏联地区所发生的变化有着更为广泛的背景。从20世纪70年代中期始,也即早于戈尔巴乔夫执政十年之前,南部欧洲的西班牙、葡萄牙及希腊等国率先发生了从军人独裁政权向现代民主法制国家的政治转变;80年代,与南部欧洲有着密切传统关系的拉丁美洲各国相继发生类似的变动;稍后,东亚地区也不同程度出现了从强人政治向选举民主制度和开放式市场经济体制的演进。到20世纪



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随着东欧地区在多年进化式改革所积累的基础上首先发生政治剧变,1991年底,前超级大国苏联在若干年摇摇摆摆的改革进程之后瞬息解体。虽然,对于上述近三十年来发生在各地区各国的制度变迁与社会转型进程究竟是偶然的相似,或是浅表的简单模仿,还是确实有着某种深刻的内在联系,尚需作深入的认真研究,但是几乎可以确认的一个事实是,当今世界的制度变迁和社会转型正以人们所感知的、或者尚未感知的某种深度与广度超越以往人类历史的类似进程。就其广度而言,人类历史上几乎还从来没有过这样一种世界各大地区几乎是同步出现的,而且是广泛发生于社会各个领域的波澜壮阔的社会变革运动。就其深度而言,工业革命以来,源于西方的民主与市场制度借助于现代传播手段得以扩展,几乎是第一次与所有各大文明地区的传统同时发生如此深入的交融与冲撞,其间所发生的对人类东西方各种各样的传统的反思和创新,所引发的各种物质与观念力量在竞争中的分化、重组,及其所迸发的能量和所产生的辐射力实在是举世所罕见的。

二

与以往任何时期的国际剧变相比较,冷战结束以来的各国内部转型与国际变化大体是在和平方式之下进行,而不似此前任何一次,国际变局非得在兵戎相见之下方告完成。而越是以和平方式推进的社会变迁,便越是显示出推动这种变迁诸种动因所具有的前所未见的深刻性和影响力。这里所指的动因既包含着人类追求公平、自由与幸福的不懈精神,也包含着对于与人类成长进步与生俱来的文明多样性的越来越多的尊重与肯定。与以往任何时期的国际变局相比较的另一个不同之处,乃是席卷整个世界的所谓全球化进程。这一进程不光是出于西方世界的意识形态的推动和物质利益的需要,同时也不可避免地与广大非西方世界各民族与多区域的振兴目标与实际需求相互之间有着某种呼应,从而形成了在各个不同层次上,要求改革传统体制、改变传统社会行为规则的摧枯拉朽般的革命式演进。全球化进程与和平方式的社会转型这两者间的相辅相成不仅是为当前国际变局奠定基调,而且使得国内体制变迁与国际社会转型之间正在产生越来越直接,同时也越来越复杂的相互关联性。

就国内社会而言,当今世界的这场深刻而又充满戏剧性变化的制度与社会转型,首先导致了既定体制框架的根本性的变迁。无论是文明古国,还是年轻民族,也无论是处于欧亚大陆的心脏还是远在大洋的彼岸,改革之风所到之处,无不为体制的推陈出新推波助澜。制度变迁与社会转型过程的强劲动力,既出自于精英阶层在全球化推动之下要求思想解放和探索民族自强道路的吁求,也来自与千百万人日常生活紧密关联的要求改善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状态的冲动。从这个意义上说,制度变迁与社会转型远不只是一种管理模式的变化,它激发起的是人们的生活与生存方式的变化,是对各类制度

环境下生存着的人们的创造能力和应变能力的考验,是对历史铭刻于各个民族心灵上的传统印记的再认识过程。转型社会中的几乎所有社会集团与阶层虽然不可能同时在这一历史进程中获得满意,但却必然会因此而改变各自的命运。

三

把制度变迁和社会转型作为一门学问来加以研究,不过是最近二三十年的事。转型研究这门学科的起源,大体上与20世纪最后四分之一时间首先发生在非欧美工业发达国家和地区的制度变迁,以及与之有关的社会转型紧密相关联。在非欧美工业发达国家和地区的制度与社会变迁中,当推作为政治范畴的前苏联东欧地区的转型最为引人注目;而在前苏联东欧地区中,以转型本身的复杂性及其所包括的深刻内容,以及由转型所产生的相互影响而言,自然是作为前苏联法定继承国俄罗斯的转型最为引起关注。无论是左翼还是右翼,也无论是精英还是平民,凡个人生活历程中与前苏联存在着各种间接或直接关联的,都会对最近这十多年来俄罗斯这块土地上所发生的一切投去关切的一瞥。

发生在前苏联东欧地区,特别是俄罗斯的转型,就其一般意义而言,乃是从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和一党体制,向现代市场经济和民主法制体制的转换。非常值得思考的问题是,这样一类起承转合的转型过程,到底有没有其内在的逻辑,换言之,有没有其内在的规律性可言。在这个大问题中实际上包含了一连串的问题。其中包括这样一场深刻转型的起因到底是什么?包括前苏联究竟缘何而解体这样一类问题,都远没有清晰明确的结论。还有,制度变迁的路径究竟是以何种方式为宜,关于激进改革与稳健改革的争论迄今仍在持续。再有,如何评价俄罗斯,包括前苏联东欧地区十余年制度变迁的结果,更是一个众说纷纭的问题。也许,在格鲁吉亚、乌克兰、吉尔吉斯斯坦等地发生的一系列“颜色革命”,是对俄罗斯及前苏联国家在冷战结束后痛苦转型过程的一个阶段性的警示:不公平的制度变迁与社会转型的一个相当可能的结局便是“革命”。当然,这一系列“颜色革命”的背后,是内部的转型与外部的大国关系的博弈这两者之间的复杂联系。这一现象再一次向我们昭示:就像当年关于社会主义能否在一国之内建成问题的争论,今天的制度变迁与转型看来也远非是一国之内可以简单地加以控制的过程。

面临这样涉及面相当广泛,却又盘根错节的宏大社会历史过程,是需要运用各种学科的知识工具加以解读的。这就不仅需要从传统的政治学、经济学、历史学、哲学、社会学等大学科知识领域出发进行分析,而且也务必从一些新兴的、本身具有交叉学科性质的学科门类入手来对转型现象进行认知,这里包括新政治经济学、比较政治学、公共选择理论、博弈理论、决策理论、文化研究等门类。还须指出的是,多年来在国际学界对之

转型时代丛书

从制度变迁所发生的各个领域的情况来观察、记录与分析 20 世纪 90 年代初以来在俄罗斯政治、经济、社会、文化与外交各个领域内社会转型的主要趋势和发生的重要问题,将有助于对这一复杂历史过程的认识与把握。

政治领域的变化应该是苏联解体以来,俄罗斯制度变迁过程中最为关键的内容。其中包含着俄罗斯政治变化的动因与性质、基本的结构及其未来的趋向这样一些主要问题的讨论。

当我们在观察自苏联到俄罗斯那一场迅速而杂乱无章的政治变化的动因时,会发现这是一个历史惯性与现实政治博弈、理想主义者的改革抱负和政治投机家的暗中谋算,以及内部政治变化与国际力量竞争等诸多因素贯穿综合而成的一个复杂的历史过程。^{*}以笔者 80 年代中期在前苏联地区的实地考察,这是一个传统体制运行久已疲惫,整个社会充满惰性,但同时又期盼着变革奇迹来临的时期。虽然戈尔巴乔夫就任之初并没有立即以激进的政治改革作为激发与动员前苏联社会创新力量的杠杆,但是,几百年来一直以政治运行为主线的俄苏社会,一旦治表式的经济调整政策失败,便立即转向期待通过政治生活重组来取得对传统体制的突破。在党内改革力量、知识分子、野心家和投机家们所形成的合力的鼓动与怂恿之下,戈尔巴乔夫执政初期还颇有起色的党内政治生活民主化进程,迅速地转化为取消共产党自身领导地位的激进之举。党的溃败显然成为这个转型中的大国无法自控的关键步骤。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俄罗斯研究中心的前主任 J. 米勒认为,前苏联的解体是一种“例外”,即从执政精英所具有的政治影响力,从前苏联体制所尚存的运行功能,包括作为超级大国所拥有的资源而言,虽然面临严峻挑战,但远不至于即刻崩溃。可见,一旦执政精英的战略失误,一个超级大国在当代条件下的政治变动便会具有远远超出理论解释与预判能力的超常规性。

相当引人注目的是苏联解体之后俄罗斯民主化进程的基本特征。从戈尔巴乔夫、叶利钦再到普京,很难断言,这三位政治家及其所代表的精英阶层乃至俄罗斯人民追求民主的理念全然是一场闹剧。直到今天,在与乔治·W. 布什总统第二任期之初于布拉迪斯拉发的首次面晤之后,普京仍然宣称,俄罗斯不打算搞任何有俄罗斯特色的民主,

从俄罗斯取得独立以来的政治结构状态来看,似乎也与上述概念的指向有所吻合。首先是,宪法所规定的俄罗斯总统对于议会和司法系统而言实际上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力。而且,在俄罗斯目前的政党制度中,总统的这种权力又因为实际上获得了议会多数党的支持,而具有超党派的面目,从而使得总统的权力可以超越代议机构。另一方面,相当具有俄罗斯特色的“无执政党的多党体制”,又使得各个政党基本上难以聚集力量来与国家的行政决策权力相抗衡。除此之外的问题是:其一,俄罗斯千百年传统中疏于法制的传统,使得任何真正的法制建设都步履艰难;而90年代中期在自由主义观念横行于俄罗斯的背景下,对于司法独立的迷信换来的却是“独立后”的司法体系难以自拔的腐败。其二,在高举民族独立旗帜下取得独立的俄罗斯,在90年代以来长期不得不奉行一个“可协商性的联邦制度”来维持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即依靠中央与地方主权单位之间无休无止的讨价还价来保持联邦制的形式上的存在。但是两次车臣战争以及90年代中期地方势力的尾大不掉,终于使普京下决心重新在联邦制结构中回归中央权力。上述的结构性因素表明了一个相对集权的或者叫做重新中央集权化的过程正在出现。

新世纪以来的俄罗斯政治发展在西方,包括在俄媒体上被冠之以“可管理的民主”的标签。尽管出发点有所不同,但这一词语本身还是比较确切地反映了俄罗斯转型政治发展的逻辑及其演进趋势。一个缺乏西方式市民社会传统的欧亚大国在模仿西方式代议民主制度时,势必会经过一个相当长时期的曲折与反复。一个由于经济发展水平的局限而尚未形成充分的社会利益集团分化的选民结构,是难以在短时期内形成真正的多党制基础的。同样,一个虽然具有反对派传统,但是在长期高压统治下,在政治权力与反对派之间并不具备良性互动的传统习惯的条件下,俄罗斯“媒体自由”的较初始状态看来也将迁延时日。

② Guillermo O'Donnell, *Delegative Democracy*, Second Edition, Baltimore: J.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96, pp. 94—108.

五

与俄罗斯政治转型紧密相关联的是俄罗斯的经济转型。

在事过十多年之后,再来反思俄罗斯“休克疗法”的发生,其前因后果都要清晰得多。然而,在当时,为什么是“休克疗法”式的激进改革,而不是任何其他类型的改革成为俄罗斯经济转型的起点,用曾经也是1992年“休克疗法”时政府核心梯队中人,现任俄罗斯总统普京首席私人经济顾问的安·尼·伊拉里奥诺夫的话来说,这还是一个相当复杂的、并且也是多种力量博弈所导致的一个结局。^①

从国内政治经济发展的逻辑过程来看,以激进方式开始实施转型是俄罗斯多年来未见成效的渐进改革的逻辑发展。“休克疗法”在某种意义上也是当时内无供应、外无援助的危机条件下的一种应急措施;从公共选择与新政治经济学的观点来看,“休克疗法”的出台是当时俄罗斯各派政治力量之间为获取政治权力而推出的一个政治工具。^②作为一系列改革方案设计者的俄罗斯前任经济部长叶甫盖尼·雅辛曾经公开证实,“休克疗法”的出台更多是当时主要政治领导人为打击对手、取得政治合法性的手段,而非一个在政策上和理论上深思熟虑的结果。^③

俄罗斯经济改革之所以取法新自由主义的“休克疗法”,还有其深刻的国际背景。20世纪70年代末期起,新自由主义取代凯恩斯主义成为西方世界的主流经济思潮,而时值前苏联东欧国家的改革家们普遍地失望于在社会主义计划体制框架下各国改革进程的停滞不前,甚至在理论上也普遍怀疑市场与计划经济相结合的可能性,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以哈耶克为代表的自由主义理论成为前苏东学界一时之主脑。除此之外,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西方主导的国际组织在给予经济援助的诱惑之下大力推广由宏观经济稳定、自由化与私有化的三位一体的激进改革模式。并且,从1989年到1990年,波兰在杰弗里·萨克斯指导下推行“休克疗法”取得部分成功,也大大刺激了俄罗斯朝野对于通过“休克疗法”能够迅速摆脱危机的预期。

虽然,对于俄罗斯推行激进式经济改革走向市场经济之后的结局仍有不同评价,但显然多数意见持否定态度。相当值得关注的是西方学者在“休克疗法”实施数年之后对俄罗斯经济转型的一片否定之词,诸如以大量使用的“等级制资本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寡头资本主义”、“封建割据资本主义”、“犯罪资本主义”以及“虚幻市场经济”等词汇来批评俄罗斯经济转型。富有讽刺意味的是,当年“休克疗法”方案的鼓吹者、设计者

① [俄]安·尼·伊拉里奥诺夫 2003 年 10 月在华东师大俄罗斯研究中心的讲演。

② Vladimir Man(1996), *The Political History of Economic Reform in Russia 1985—1994*, Moscow, pp. 49—64.

③ Ясин Е.Г. Переходная Экономика. — М.: Высшая Школа Экономики, 2002. Первая часть.

与实施者,诸如大名鼎鼎的杰弗里·萨克斯、亚诺什·科尔奈,包括叶甫盖尼·雅辛等人都在十余年之后,在不同程度上公开检讨了“休克疗法”式改革的弊端。

十余年来经济转型留给人们思考的问题还不止于此。

其一,关于体制转型中的增长与结构的关系。自1999年普京执政以后,俄罗斯经济开始全面复苏,迄今已进入了稳步增长的第六个年头。但对当年“休克疗法”的基本评价仍未扭转,即虽然“休克疗法”实施之后,苏联式计划体制确实已经不可能再卷土重来,但是,“休克疗法”下导致的转型至多仅提供了极小一部分的增长动力。关键的问题是,制约俄罗斯持续发展的结构性问题并未得到解决,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俄罗斯仍将基本上通过出售战略物资和能源原材料维持增长这一点,依然显示了俄罗斯对国际市场的高度依赖。俄罗斯经济的稳定增长有赖于经济结构的优化与调整。

其二,关于民主与市场的相互关系。改革之初,俄罗斯改革家们信奉“民主体制与市场经济的天然联系”的法则,曾经憧憬在短时间中能够建立既有民主又有市场的发展模式,但转型研究的事实表明,尽管民主与市场的相互支持在欧美发达工业文明条件下总体而言已经得到了证实,但在广大的非欧美工业文明地区,民主与市场并不一定呈正相关关系。政治市场上的博弈结果往往会导致选择一个低效甚至是无效的制度。这种干扰性表现在市场制度形成过程中国家有效干预的缺位,非正式规范,特别是腐败的泛滥,再加上分配领域贫富差距迅速扩大。近年来,严重困扰俄罗斯政治经济发展的“尤科斯事件”,反映的不光是俄罗斯政商关系的持续紧张,而且也是对天真幼稚的“市场与民主天然联系论”的一个惩罚。

其三,关于一般西方经济学原则与俄罗斯民族经济思想的关系。近年来,阿巴尔金院士所发起的关于是否存在俄罗斯民族经济思想的讨论曾一度激起广泛反响。反驳者认为,经济学是普世的学问,亚当·斯密、李嘉图的思想可以为人类所共有;但赞成者认为,俄罗斯特有的人文与地理环境等禀赋不可避免地为形成俄罗斯特色的经济思想与经济转型模式提供依据。比如深植于俄罗斯国民灵魂的村社式的非市场经济传统在何种程度上限制着市场的发展;比如浩渺辽阔、气候恶劣的地理环境为商品交换与市场的正常发展添加了多大的超乎常人想象的障碍。至少,上述因素将导致市场运行的相当大程度的变形。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阿巴尔金认为,不能照搬西方经济理论中的“经济人”范畴,他反对脱离环境、脱离社会进行静态的经济活动分析,尤其要强调作为整体的国民经济和国家的作用。俄罗斯十余年转型经济的经验,并没有绝对排斥一般西方经济学原则的理论重要性,但是,至少在实施这些理论原则时将如何保留俄罗斯特殊性的问题上,过去十余年的艰难历程已成为一种无可替代的警示。

六

就转型期的俄罗斯而言,制度变迁的空间与载体是俄罗斯社会,而俄罗斯社会转型

同时也是制度变迁的对象与结果。

可以从三个方面来把握俄罗斯的社会转型问题：第一，独立之后俄罗斯的社会政策与社会问题；第二，俄罗斯的社会结构变化；第三，转型期俄罗斯社会文化思潮的变迁。

与政治制度的转型相呼应，转型阶段的俄罗斯社会关系与社会问题，呈现出许多令人关注的特点。随着政治与经济体制的变迁，前苏联大包大揽式的社会福利政策难以为继，从养老金、医疗保险一直到老年人的交通津贴、免费住宅等等，这一切都不得不转入新的社会—市场统筹解决途径。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成为当前影响政治稳定、并且从长时期看也是俄罗斯社会能否持续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与此相关联的一个颇有俄罗斯特色的社会问题，乃是以以前已经迅速呈现、并将在今后二三十年中进一步发展的人口下降趋势。据估计未来不到半个世纪的时间里，俄罗斯人口将减少到只及2000年的59.4%。与此同时，老龄化程度迅速提高，届时每100个劳动年龄人口对应的老年人将达到41个。社会政策领域的另一个重大变化乃是教育体制的改革。具有悠久传统的国家统一管理的教育模式被打破之后，如何面对教育领域的竞争格局、如何保持并适应转型期的社会需求也成为全社会关注的问题。

在上述社会政策与社会问题的背后是起于前苏联晚期的俄罗斯社会结构的深刻变化。一方面是作为社会阶层与集团的传统产业工人、知识分子、妇女、青年的状况正在变异，特别是产业工人与知识分子近于被边缘化。另一方面是社会仍处于高度分化状态：一小部分暴富者和数量庞大的贫困阶层并存；中产阶级的出现虽然有助于社会的稳定，但是无论是他们的人数还是地位与能量都尚有大量争论，远不能发挥类似于西方国家中产阶级的作用。普京执政以来，无论是居民平均收入还是贫富差距问题都有所遏制，但仍无法在短期内使得情况得到大幅度改善。

值得一提的还有当代俄罗斯人的精神世界，对于俄罗斯这样一个具有优秀人文传统的国家来说，十多年社会转型的冲击与洗礼，与其千百年所经历的风险与磨难相比还只是一个短暂的片段。虽然，在社会变革的狂飙之下，俄罗斯人的自身认同问题，以及通过哲学、史学、文学，以及语言与造型艺术所表达的精神境界与品位，已经与前苏联时期有了很大的差异，人们可以感知当代俄罗斯人在剧变后的那种失落与迷惘，以及在艰难求索中的那种痛苦与沧桑之感。但是，通过作品，通过交往，通过体味，人们也同样可以领略到有时甚至是以调侃方式表达的一种自强不息的精神、一种多样化的追求、一种不脱欧风欧味但仍具有鲜明本土特色的质朴与豪迈的禀性尚存于俄罗斯人中间。

简言之，从总体社会转型的角度来讲，俄罗斯社会虽然已经转变，但尚未定型。一方面，从意识形态到平民行为，从社会组织方式到家庭伦理规范，都体现了制度变迁后俄罗斯所承受的巨大冲击。但是另一方面，随着制度转型的深入，人们认识到，俄罗斯社会与苏联社会之间乃至前苏联时期之间，仍然保持着广泛而深刻的承继性；而且无论是新老精英之间的赓续，还是反映深层认同意识的人文精神，在社会结构



变化的诸多层面都呈现出一种在各个历史阶段之间斩不断理还乱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复杂图景。

七

苏联解体之后的俄罗斯对外战略,既是其国内政治、经济、社会乃至人文思潮变迁的一种延续;同时,俄罗斯对外关系的调整也为国内体制的变化不断输入动力,并提供了空间。转型时期的制度变迁与对外关系的相关性问题,始终是俄罗斯研究中的一个核心问题。

十多年来,俄罗斯外交历经了一个不断求索、定位,再求索、再定位的过程,与此相应的外交表现也显得纷繁复杂、迷离扑朔。如何把握俄罗斯外交的线索,至少可以通过以下几个方面进行观察:其一,俄罗斯外交的渊源及其形成;其二,俄罗斯外交的环境与资源;其三,俄罗斯与大国之间、与周边国家和地区之间,以及与较远国家的相互关系。

俄罗斯转型期的政治领导人物与学术界,对于苏联时期外交战略的反思,是形成俄罗斯对外战略的一个重要的思想来源。当然,无论是戈尔巴乔夫、叶利钦还是普京,实际上都难以对苏联的外交采取全盘否定的态度,但是,对外政策的非意识形态化、反对付出国内资源难以承受的代价去实施对外战略,特别是以人类意识、以人类文明共同体的立场作为俄罗斯外交的出发点,已成为不同于前苏联的、俄罗斯独立后早期外交战略的重要原则。90年代中期之后,全球化的理念广泛传播,对一个资源、市场高度一体化的国际社会的认识,已成为俄罗斯外交发展的一个重要背景。从发展经济和改善战略环境的考量出发,俄罗斯外交表现出向西方接近的趋势。但同时,俄罗斯独特的地缘政治条件下所形成的欧亚主义意识(既向西方也向东方,持有欧亚观念而不是单边西向的立场),也成为影响俄罗斯外交的一个重要因素。俄罗斯毕竟是大国,不光着意于国际秩序的构建,而且也从自身经历中提炼了关于国际公正、反对霸权、反对单边主义的思想,这为其日后接受国际多元格局的理念作了重要的铺垫。

作为一个传统大国,在一个不断受到削弱的空间中,要转变成为与其他国家,特别是相邻国家平起平坐的正常“民族国家”,并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无论是精英还是平民,尽管其对国家对外战略的看法还不尽相同,都经受了—一个痛苦的转折,但一个不争的事实是,俄罗斯的对外战略只能在既定的资源与环境中运行,这已经大体上成为俄罗斯普通人与精英阶层的共识。

就俄罗斯外交的资源而言,无论是得天独厚的原料能源、占世界前列的战略力量、军用品出口和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大国地位,还是俄罗斯所具有的独一无二的地理条件——它的疆域连接着几乎所有当今世界的大国和当今世界的敏感地带——都可供俄罗斯在折冲斡旋中加以运用,甚至有人认为俄罗斯的外交资源要大大优于其内部政治

经济可供利用的资源。但是,俄罗斯所面临的战略环境已经与冷战期间有着根本的不同:首先是传统的势力范围已经丧失多半,即使仅存的独联体国家之间的联合,也经受着一次又一次“颜色革命”的冲击而岌岌可危;更为严峻的形势是面临着北约与欧盟的同时东扩,俄罗斯的政要与精英向西方靠拢的立场一次又一次地受到冷遇,因而,无可奈何之下,也不得不一而再、再而三地向西方显示其强硬姿态,尽管,在这样的姿态背后已经没有了往昔那种鱼死网破的决斗意识。

对俄罗斯外交而言,也许,这是对所有国家外交的至理名言,即如何在多变的国际事务中善于抓住机遇,只有抓住了机遇才可能真正有效地利用资源,把于己不利的国际环境转化为于己有利的新局面。“9·11”事件算是一次机遇,普京总统借此而大刀阔斧地推进与美国的合作关系;伊拉克战争又是一次相反意义上的机遇,俄罗斯抓住这个契机大步接近德国与法国等国,成为反对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的坚定派。值得探讨的问题在于,俄罗斯如何才能在灵活应变把握机遇和确保其立场的稳定性方面进一步保持平衡以取得更多的外交利益与空间。

就当代俄罗斯与大国之间、与周边国家和地区之间,以及与较远国家之间的关系来说,第一,戈尔巴乔夫在高举全人类利益的旗帜时忽略了本地价值与本土利益,而叶利钦则大步迈向西方,尔后又通过与中国发展合作来加以平衡却彰显其摇摆态度。相比较而言,普京的对外战略则相对平衡与灵活,尽显出根深蒂固的实用主义立场。其次,普京总统下定决心不与美国这个头号超级大国以及与欧洲为敌,同时竭尽一切力量在相应的地区发挥适合其地位的影响。再次,对于俄罗斯来说,其构想中的全球格局,特别是与其振兴远东战略密切相关的中俄关系的稳定不是权宜之计,而是长远的战略考虑。也正因为如此,才有了在东北亚能源管道问题上的反反复复的戏剧性变化。包括基辛格在内的诸多学者认为,在当今世界政治经济领域的关注重心由西方转向东方转移之际,中俄关系保持睦邻与良好的合作状态是既有利于双方,也有利于全局的明智之举。

八

在对俄罗斯转型过程作了一个提纲挈领的概括与提炼之后,需要进一步从理论角度来作一些小结。

第一,制度变迁与社会转型过程中的“统一”与“多样”的相互关系问题。虽然,俄罗斯进入转型阶段的历史还非常短促,但是一个值得高度关注的现象已经越来越清晰地呈现于世人面前,那就是:转型与制度变迁作为一个具有内在联系的客观统一的进程,存在于广大地区的多个国家,但同时这一进程又具有复杂多样的路径依赖,形成了各不相同的战略选择,并且表现为尚未终了的、面貌各异并被制度化了的转型结果。就像著

名的转型理论家青木昌彦所言：“我们将看到全球性制度安排的双重趋势：一方面是跨国国家制度的重要性上升；另一方面是地域性国家和地方制度多样性的持续深化。”^①与其他转型国家相比，俄罗斯十四年来的转型，正是这样一种内在统一的、与其他国家相类似的，但又是多样的、独特的转型过程的鲜明体现。

第二，转型中“政治”与“经济”的相互关系问题。从西方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上，我们通常可以读到，“民主政治”有利于推进市场化，反过来市场化改革也有助于稳定民主政治这样的信条。但从俄罗斯转型过程来看，并没有表现出“民主政治”与“市场”的直接相关性。经常看到的现象是经济安排更多的是政治支配力的一种功能，而不是相反，1990—1992年初“休克疗法”改革方案的出台大体上说明这一点。虽然，经济改革的确加强了倾向于民主政治的某种力量，私有部门的崛起导致了利益格局的多样性，但是，往往在转型的过程中形成的经济动荡与社会分化也会激发起社会的不安定与反民主因素。近年来，俄罗斯政商关系的紧张和重新中央集权化的出现，就反映了这一问题。所以，相比较而言，转型进程中的政治支配力占据优先地位的论断，看来还是有根据的。^②

第三，转型过程中的“连续”与“中断”的相互关系问题。俄罗斯采取“休克疗法”式的改革，其实质是希望通过与前苏联的历史一刀两断，从而获得其政治合法性。但是无论是转型前后的精英阶层表现出很大的连续性（有学者以此与中国相比较，认为俄罗斯新精英阶层中有大得多的比例来自于老精英阶层），还是民间意识表现出更多与前苏联时期的难以割舍，都集中体现在自称为是前苏联的“正常公民”的普京总统身上。有越来越多的专家认为，转型期间的许多问题更多地是来自于前苏联时期的既定结构与惯性。

第四，转型过程中“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的相互关系问题。总结俄国历史上历次“制度引进式”的社会变革，可以发现，制度引进的成功与否取决于“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两者的叠合。有人认为，彼得大帝之后的“西化改革”由于叠合程度弱，因此，制度引进之后的趋异和排斥现象成为制度发展的主要路径，尔后俄国历史发展表现出一种与西方貌合神离的态势；而十月革命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得益于苏维埃制度与传统俄罗斯制度的叠合程度较高这一原因。看来，90年代初的“第三次制度引进”，同样出现“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之间的较为强烈的排斥与趋异。因此，新制度学派的观点是俄罗斯的新旧制度叠合需要一个相当长的而且是经历不断反复的时期。从俄罗斯转型的近期经历看，这样的分析还是有一定道理的。

第五，平民主义与重新中央集权化的相互关系问题。俄罗斯著名经济学家符拉基米尔·毛90年代中期曾经指出，以新自由主义为导向的俄罗斯改革很有可能出现一个平民主义崛起的结局。这不只是“不公正的改革可能导致革命”这样一种逻辑的推

① 青木昌彦：《比较分析制度》，周黎安译，上海远东出版社2001年版，第391—392页。

② Grame Gill, *Democracy and Post-Communism*. Routledge, 2002, pp. 174—193.

演,而且也是从其他地区的转型实践,比如拉丁美洲地区从自由主义到平民主义的历史变迁的先例中得到印证的一个结论。如果说,平民主义现象是普京重新中央集权化措施的一个前奏与基础,那么,可以预计,在不放弃的自由主义原则与旗帜的前提下,普京的新政将会继续在自由主义与平民主义的立场之间取得平衡。也许,法国大革命之后的拿破仑现象可以成为今天观察普京未来路线的一个出发点,即革命死了,但是革命的精神是否可以通过中央集权化的拿破仑式的调节与控制而得到保存。

最后,制度变迁与对外政策的相互关系问题。90年代以来的俄罗斯对外关系发展大体上是以国内体制变迁的起落程度为标志的。90年代初,对“休克疗法”神奇功效的迷信是与对西方国家发展紧密关系的热切态度紧密联系在一起的。90年代中期当转型陷入困境时,俄罗斯与大国间的关系立即出现变化,不仅开始批评西方,而且主动与中国发展起战略伙伴关系。普京执政以来俄罗斯的转型在经济进入持续恢复阶段的同时,政治上出现回归趋势,其实质是俄罗斯国家希望进一步取得对已被私有化的资源(特别是赖以作为发展主要源泉的能源)的重新控制。被恐怖主义、油价高涨和武器扩散搅扰得心神不定的西方大国,迫不得已与俄罗斯进行合作。但是理念与地缘政治利益殊殊,尤其是内部体制演进方向与西方的日益趋异,又使得它们对俄罗斯的未来耿耿于怀,于是,就有了以“颜色革命”一类手段对俄罗斯进行旁敲侧击,以期实现遏制与弱化目的的一幕幕活剧。

如同俄罗斯与西方大国之间的合作与较量将不会停止一样,俄罗斯内部的制度变迁与社会转型进程,也将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中成为国际国内学术界的一个热门话题。

为了对上述重大历史进程给予系统的记录与梳理,并从我国学界与国际学界相互交流与比较的角度之下深入地进行研究,《转型时代丛书》不光集中了国内从事政治学、经济学、历史学、哲学、社会学、心理学、文学、国际政治等多方面资深学者长期研究的成果,而且跨出国门,邀请了一批具有广泛国际影响的著名学者参与,其中包括经济学家、现任俄罗斯总统私人经济顾问的安·尼·伊拉里奥诺夫,俄罗斯经济部前部长、著名经济学家叶甫盖尼·雅辛,还有美国最为活跃的研究俄国问题的机构——卡耐基金会莫斯科中心主任安德鲁·卡卿斯,美国弗吉尼亚大学俄罗斯研究中心主任艾伦·林奇以及布鲁金斯学会的著名学者克里福德·G. 盖迪等人。

像这样对俄罗斯转型及其对外关系问题的全面系统研究,囊括了这么多一流学者和优秀中青年专家的参与,无论对于作者,还是对国内学界都是一项新的、同时也是无比艰辛的探索。但愿这项成果的问世,能够引起国内外同仁对转型问题的更多关注和更为深入的研究。

前言

对外战略,亦可称之为国际战略,“指的是一国对较长一个时期整个国际格局,本国国际地位、国际利益和目标,以及相应的外交和军事政策等的总的认识和谋划”。^① 转型时期俄罗斯的对外战略表现出一条清晰可见的发展主线,即维护、发挥和争取俄罗斯在国际舞台上的大国地位。伴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和俄罗斯国内政治、经济和社会变迁,俄罗斯的对外战略也经历了探索、调整和再定位的过程。如果说 20 世纪 90 年代初叶利钦政府是将俄罗斯大国地位的维持寄托于融入西方和建立俄美“伙伴关系”之上,主要特点在于“维护”;那么 90 年代中期之后,俄罗斯选择的路径是注重发挥其在前苏联地区的影响力以及与其他重要国际力量互为倚重,侧重点在于“发挥”;而伴随着新世纪之初国际环境的巨变,普京政府意识到内部发展对于俄罗斯国际地位的至关重要性,强调对外政策首先应“服务”于内部发展,俄罗斯对大国地位的诉求定位在“争取”这个层次上面。

转型时期俄罗斯对外战略实际上“始于苏联时代”,始于苏联最后一位领导人戈尔巴乔夫发动的革新运动,是其“新思维”的产物。^② 苏联自立国以来的对外战略主要是基于三个前提来确立的:国际政治恒久不变的特征是社会主义和非社会主义阵营之间的国际阶级斗争;苏联的安全和威望有赖于社会主义阵营的巩固和壮大;为实现上述目标,苏联必须确保军事上的与最主要对手之间的优势地位。戈尔巴乔夫完全摒弃了苏联对外战略的传统观念,强调全人类的共同利益,以同一性取代冲突不可避免论;强调各个国家“选择的自由”,放弃对东欧的控制;强调核时代安全的相互性,放弃对军事优势地位的争夺,进而裁减军备。在苏联帝国崩溃,欧洲社会主义集团瓦解,与西方军备竞赛终结的背景下,新俄罗斯的对外战略是基于戈尔巴乔夫外交新思维来确立的:同西方进行合作进而融入西方世界。这就是自 1987 年以来先是苏联后是俄罗斯外交政策指导方针。

新俄罗斯在政治、经济和文化上开始了一个面向西方的进程。然而,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的那种毫无保留地与西方合作并寻求融入西方的政策并未能长久维持下去,这

① 张继良主编:《国际关系学概论》,世界知识出版社 1989 年版,第 73 页。

② Michael Mandelbaum, ed., *The New Russian Foreign Policy*, A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Book, p. 4.

一方面是俄罗斯在后共产主义时代所面临的困难——经济崩溃、社会失控、政治混乱——所导致的，许多俄罗斯人将之归咎于西方，认为它未能兑现曾经许诺的大规模经济援助，西方的经济专家替俄罗斯的经济病开出了错误的药方……更为严重的是，1993年底的议会选举结果显示俄罗斯公众情绪蕴含着一股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虽然它尚不至于主导俄罗斯的外交战略定位，但这种情绪显然是与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推行的“新思维”外交格格不入的，因此，在1993年以后，这种情绪妨碍着叶利钦继续推进其面向西方的对外战略。

另一方面，苏联解体后俄罗斯所面对的新的周边环境也是促使其在外交上作出调整的重要背景。剧变造成俄罗斯四邻不宁，尤其是在南部，战争在高加索和中亚爆发，直至蔓延到俄罗斯境内。俄罗斯被牵涉进格鲁吉亚、亚美尼亚和塔吉克斯坦的武装冲突，尤其是在1994年底，俄罗斯对试图脱离联邦的车臣分离主义势力发动了战争。

俄罗斯内部政局的变化引起了西方的关注，其对近邻周边的政策招致了西方的批评。实际上，对俄罗斯内政外交的未来走向琢磨不透的西方所做出的反应还远远不止是言辞上的，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北约东扩被提上日程。而这在俄罗斯政治精英看来，说得轻点是表明西方无视俄罗斯对于东扩的敏感，说得重点是标志着西方开始转向排斥、孤立和敌视俄罗斯的政策。

从1994年到2001年，俄罗斯的对外战略进入一个调整和重新定位的时期。这一阶段俄罗斯在对外战略上的一个重要变化就是叶利钦在1994年初“国情咨文”中提出的俄罗斯应结束“单方面让步的做法”，在不放弃争取同西方国家建立伙伴和合作关系的同时，努力显示其作为“世界大国”的地位和作用以及捍卫国家利益的决心。在具体的外交实践中，俄罗斯除了更加强调在前苏联地区的影响力和注重发展与包括中国和印度在内的东方大国之间的关系外，在与西方国家的关系领域，一方面在加入发达国家俱乐部、确立与北约的新型关系、继续推动军备控制谈判和战略武器的削减等方面发展与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的关系，另一方面，俄罗斯与西方在地区热点问题、北约东扩、《反弹道导弹条约》等问题上发生摩擦。

20世纪90年代俄罗斯对外战略的发展演变，显示出了一个“极端化”的变化过程：首先是“过高的期望”，“期待着由冲突彻底转变到靠近西方国家，从而自动改变西方国家对俄罗斯的态度，获得大量的政治支持和经济援助”^①。90年代中期以后的俄罗斯对外政策则走向另一端，表现出较强烈的苏联对外政策留下的“超级大国”心理遗产，无视国内资源是否可能承受，极力参与各种各样的国际进程。事实上，这两个时期俄罗斯的对外政策都存在着“期望过高”的弊端，前期是对外部世界，后期是对自身实力，前期以失意而归，后期也是失望大于希望。

正是从这些具体的对外政策经验中，俄罗斯的外交战略逐步走向成熟，“今天，俄罗

① 伊·伊万诺夫：《俄罗斯新外交——对外政策十年》，当代世界出版社2002年版，第5—7页。